舞剧跨媒介叙事的进阶与挑战
▶10版·文艺百家

怀旧乌托邦与治愈系影像缔结同盟
▶11版·影视

犍陀罗艺术的传播促成人类文明早期影响深远的全球化
▶12版·艺术

人的现代化与重大主题电视剧的精神图景

张斌

观点提要

近几年重大主题电视剧越发重视对人的深度描写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中赋予人全新的精神面貌，共同描画出新时代人的现代化的演进图景。

同时，重大主题电视剧有关人的现代化的叙写，不仅表征在剧中人物角色的现代化，同时还指涉电视剧艺术家创作该角色时注入的现代化意识，双重叠加产生人的再现代化的转换过程，因而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关注。

无论是《县委大院》的梅晓歌（左）、《幸福到万家》的何幸福（中），还是《大山的女儿》的黄文秀（右），虽然存在迥异的身份属性，同时身处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，但他们却拥有不同时代都需要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自觉，也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。

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面向，即人的现代化。众所周知，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作涵盖重大历史、重大革命、重大现实题材等内容，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生动地展现人的现代化这一重要面向，反映在重大主题聚焦党和国家在发展历程当中的重要时期、重要事件、重要人物，进而描绘出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图景。

具体来看，这些重大主题电视剧当中人的现代化呈现在三个层面，即思想的现代化、伦理的现代化以及观念的现代化。

思想的现代化：对中国道路的探寻

“方向决定前途，道路决定命运”，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首先是对中国道路的探寻。

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对救国救亡道路的艰难探寻，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寻，抑或是当前正在进行的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探寻，都说明中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进程。

而在中国道路的百年实践中，无数先行者的思想探索构成人的现代化的鲜活底色，《觉醒年代》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映。

五四前后，以北大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的中国思想界，对未来中国走向何方处于迷茫之中。当时的中国面临何种境况呢？皇权虽倾倒，但是保皇派犹存；欧美之路似好，巴黎和会却暴露了真相；无政府主义、改良主义大行其道，但现实实验纷纷宣告破产。中国到底要走向哪里？陈独秀、李大钊等思想先行者逐渐将目光转向东方，投向苏联，找到布尔什维克，找到马克思主义，并相约建立中国共产党，成就开天辟地的历史大事件。

《觉醒年代》深刻折射出知识分子群体在追寻国家道路的过程中，所经历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完整历程。该剧不但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探索，而且生动刻画出不同群体知识分子各种思想观念间的相互交流、交锋与质询，成功塑造历史大变革关头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思想万花筒，细致地阐明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道路的艰难探寻之路。这种对道路追寻中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全景式铺展，给《觉醒年代》的艺术质量烙印了非常浓重的人文底色，形成它不同于以往所有电视剧的历史底蕴与时代气质。

《功勋》同样延续重大主题电视剧对中国式道路求索的创作取向。

八位来自不同时期，不同领域的国家功勋人物，承载了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的奋勇之路，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功勋人物卷帙浩繁的人生履历和功绩，恰恰证明人的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，其中这些功勋人物迸发出的思想力量与精神气韵，为中国式道路的追寻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。

伦理的现代化：对中国情感的体认

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意蕴。人是在动态性、状态性的社会关系当中生成，人的社会化属性体现在人与人发生各种物质或者精神上的互动连结，并构成不同层面的伦理关系。因此，人的现代化，也必定指涉伦理关系的现代化。

《人世间》通过围绕周家几代人的命运起落，展现了中国式社会不同类型的伦理关系，将伦理的现代化描写得尤为充分。

首先是家庭伦理。周家作为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，故事以周秉昆为轴心，通过周秉昆和郑娟的夫妻伦理，周秉昆与父母、孩子的亲子伦理，以及周秉昆与周秉义、周蓉的手足伦理，从而编织出传统中国式家庭伦理关系的多重维度。《人世间》透过家庭伦理书写着“家本位”的和谐价值观念，在家庭段落的故事讲述中，不同时期家庭成员对“家”的羁绊与守护，既彰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优点，同时也渗入具有先锋、带有创新的社会主义家庭伦理新元素。例如郑娟的自我奉献精神，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在传统家庭关系中的自我牺牲，但同时角色具备的独立自主、坚韧自强的当代女性气质，又使其成为聚合周家奔赴美好生活的积极因子，有关“人”的新旧道德观、价值观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尽情展现。

其次是工作伦理。工作场域的伦理表达落实在价值感的获得，这主要体现在周家父亲以及周秉昆及其工友身上。周父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，抛家舍业奔赴于西南大三线建设长达20年，但周父却在沉甸甸的“八级工”认定中找到工作赋予的归属感。同样，周秉昆与六小君子命运多舛的工作经历以及彼此间的关系走向，构筑出中国底层工作伦理的现实性与温情感。

再次是政治伦理，体现在周秉义、曲书记为代表的官员干部身上。周秉义从政之后面临家庭伦理、社会伦理对他的双重诉求，在中国人情世故、官场文化的裹挟之下，他最终站向最广大人群利益的立场上，充分展现执政党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。另外，曲书记给予六小君子的多次帮助，打破既往电视剧对党员干部工作方式的刻板塑造，生动描绘出人有情、事有度的书记形象，最终建立起勤恳、坚韧、正义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观念。

可以说，伦理的现代化蕴含着对民族情感和社会风貌的充分体认，同时承认人在社会关系中具有多种需求与复杂面向，从内部家庭伦理出发，连通外部工作伦理、政治伦理，进而勾勒出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共同遵循的家国伦理经纬。

观念的现代化：对中国模式的诠释

重大主题电视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，最终会落脚在对中国模式的深度诠释上。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简单接受西方制度和价值观的“全盘西化”，相反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打破了“现代化=西方化”的迷思，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，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。因此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中国模式，一种来自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内生性迸发，展现了多元、异质、丰富的另一幅现代化图景，即要实现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”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化。

《山海情》对中国模式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阐发。该剧严格意义上是一部“去贫”剧，因为扶贫是通过外来力量的介入实现脱贫致富，而去贫却必须根植于农民主体性的内生动力。《山海情》中国家东西协作扶贫战略的推动落实与发挥作用，关键有赖于农民自身对未来生活向往的主动认知与积极追求。剧中得福、得宝、麦苗、水花等新一代农民的成功，源于他们在传统自强观念的基础上主动接受现代的市场观念、生态观念。《山海情》找到了一种合理讲述中国脱贫实践的方式来回应新时代问题，突破以往电视剧广泛存在的依靠外在力量推动农村发展的叙事模式，不仅彰显了中国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，体现东西协作扶贫的共同富裕模式，同时也凸显中国农民作为追求美好生活的主体，其主体性观念的现代化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性。

主体性问题是人的现代化问题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，人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，同时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目标，人的现代化应该优先于社会的现代化同时又成为社会现代化的结果。于是无论是《幸福到万家》的何幸福、《大山的女儿》的黄文秀，还是《风吹半夏》的许半夏、《县委大院》的梅晓歌，这些主要角色虽然存在迥异的身份属性，同时身处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，但他们却拥有不同时代都需要的主人翁意识和主体性自觉，通过超越所在阶层局限的价值选择，实现对自我主体意识的不断建构，背后也折射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。此外，这些重大主题电视剧还将以往“边缘化”的群众形象进行前置，通过赋予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，彰显人民力量对于中国模式的实践价值和时代意义。

不难发现，近几年重大主题电视剧越发重视对人的深度描写，而且不同重大主题内容之间还存在明显的人物群落关系，这些电视剧重新书写原来以阶级划分人群的固定思维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中赋予人全新的精神面貌，共同描画出新时代人的现代化的演进图景。同时，重大主题电视剧有关人的现代化的叙写，不仅表征在剧中人物角色的现代化，同时还指涉电视剧艺术家创作该角色时注入的现代化意识，双重叠加产生人的再现代化的转换过程，因而值得我们持续深入关注。

（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、副院长）

文学新观察

无处不在的书单：谁决定我们读什么书

霍艳

当下人们的阅读越来越依赖书单。书单的种类、主题多种多样，作用从指导阅读变成可以被转发收藏，它的背后缠绕着一系列的权力关系，值得辨析。

书单的本质是清单。作家艾柯在《无限的清单》里这么写道：“清单是文化的根源，是艺术史和文学史的组成部分。清单并不破坏文化，而是创造文化。”至于为何要开列清单，艾柯认为世界的无限不能被全部掌握，却带给人们一种不安的快感，开列清单就成为一种用具体暗示无限的尝试、一种对事物界限尽可能的把握，为漫无秩序的事物赋予新的秩序。

清单还可以分为实用清单、诗性清单。前者出现在日常生活里，将繁琐的事物条理化以提高工作效率，或是帮人们记住不想遗忘的事情。后者出现在艺术作品里，呈现广阔的精神世界，表达人们对多元、无限知识的追求。

书单作为一种历史悠久且极为重要的清单，既指引人们阅读、构建知识体系，也展现着开书单者辽阔的精神世界。传统的书单既有教育部推荐的必读书目，也有大学老师开具作为修读学业的门槛，以及传媒通过开书单来表达自身的文化定位与品味。但当下一些书单里混进了杂质，变得越来越功利性，开书单也变成一种权力的竞争，且从权威人士转移到普通人手中，形态也从自上而下到充满互动，书单可以推荐、可以收藏、可以标记、可以延展。

最热闹的是自媒体开列的书单，相比纸质媒体的品味标榜，自媒体则基于社会热点和人性痛点，一遇到重大事件发生，就迅速以开书单的形式帮人们了解状况，或是帮人们通过阅读“自我疗愈”。还有大数据计算的书单，如“阅读人数最多书单”“评价指数最高书单”，满足了从众心理。个人书单也不断涌现，既是对阅读经验的总结、对阅读成果的展示，也是对自我思绪的整理，从个人书单能清晰地看出一代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和他们的所思所想。

但无处不在的书单导致阅读变成一场比拼。谁先完成书单？谁能不断更新书单？谁收藏更多书单？读书就成为一种负担，让人陷入焦虑，久而久之人们连书都不读了，只收集书单。而当书单直接影响了图书的销量和经典化，越来越变成一种宣传手段，就要防止夹带私货，把不属于这个层面的作品也塞进来。一旦人人都可以开书单，书单的纷杂无序也有可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。

书单在当下所以受到青睐，是因为它瞄准了两类目标人群：一是年轻人，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，他们想要扩充自己的知识体系，却并不知该如何选择；二是中产人士，他们充满着对生活的焦虑，想要通过书籍获得实用知识来稳固住自己的地位，也想要了解更多人文、社科知识来对身处的世界做出判断，倦怠的心灵也需要被文学书籍治愈。他们的时间紧张，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，就更加需要书单。

于是，书单日益演变为固定形式。主题分为设身处地类——“这份书单你没看我一定会伤心”，一生总结类——“一生值得反复读的书单”，紧跟热点类——“追剧还不过瘾？这份‘扫黑’书单送给你”，实用价值类——“那些看完了会觉得‘有用’的书”，名人推荐类——“百名北大教授力荐的经典图书”。通常的格式是由导语引出话题，揭示制作书单的原因，然后是封面图片、内容介绍和推荐语，推荐语点出阅读的目的性，却缺乏历史脉络和逻辑推导，最后在结尾给出购买渠道，不能转化为消费的图书很难获得推荐，相应也缺乏版本的意识。书单有着越来越短的趋势，不是因为精炼、浓缩，而是看起来容易被完成，不会造成读者的心理负担；很多书单把经典和新书进行大杂烩，把很多未经历时间检验的书籍加入到序列中来。书单曾经是以有限来接近无限，但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局限，知识不断被压缩，直至成为“15本一天就可以读完的经典好书”。

到底需不需要书单？弗吉尼亚·伍尔芙曾嘱咐：“关于读书方面，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提出的唯一劝告就是：不必听什么劝告，只要遵循你自己的天性，运用你自己的理智，做出你自己的结论，就行了。”1925年《京报副刊》请各界名流为青年推荐十部必读书籍，鲁迅回复说：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。”他以传授阅读经验代替给青年人开书单。作家阿来也说读书讲的是缘分和私人化阅读体验，书单没有必要。

但当下人们不光需要书单，甚至越来越依赖书单。面对一个知识膨胀、话语冲突的时代，人们感到迷茫，不断经历着各种信息、人性的反转，想要从书籍这种稳固的形式里找寻意义的确定感。同时人们把读书视作获得知识、具备某种素质的快速通道，讲求速成。

依赖书单的同时也暴露出人自身的惰性，书单本是用来不断完善人的知识体系，一方面给出指引，该读什么书？另一方面给出线索，还可以读什么书？这需要一个主动探索的过程，根据书单的提示再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、兴趣、能力，不断扩大阅读的范围。但事实上人们以为有书单在手就可以一劳永逸，把收藏书单变成了一种阅读风尚，忽略了背后知识体系的搭建和各种知识间的相互关联。

书单可以塑造经典，也可以挑战经典。曾经《星期日泰晤士报》开列作家的“欲烧书单”，上榜的既有狄更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弗吉尼亚·伍尔芙、DH.劳伦斯等经典作家，也有萨尔曼·拉什迪、伊恩·麦克尤恩、多丽丝·莱辛等当代名家。《鲤》杂志也举办过一个“最恨书单”活动，想让陈旧的经典作家退出书单，把年轻人正在阅读的村上春树、伊恩·麦克尤恩、卡森·麦卡勒斯、纳博科夫、约翰·欧文加进去，它质疑的是当经典逐渐失去流传性时，还能否称得上是经典？也有出版机构发布过“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”，上榜的都是文学经典，反映了“浅阅读”“快速阅读”“碎片化阅读”概念的流行导致的“去经典化”和对经典严肃意义的消解，值得警惕。

我理想中的书单是一种实用性和诗性结合的书单。它由资深人士开列，保持权威与公正，收录的不光是经典、精彩的作品，还有他们对于作品富有见地的阐释，让阅读与现实发生碰撞。这个书单不是封闭的，它可以不断延展，引领人们继续探索，与固有的知识体系发生碰撞，激发新的火花。它随时代发展而变化，依靠新作品的加入不断调整和整体间的关系，使得整体性的秩序稳固而丰富。它富有层次感，能不断进阶，向更复杂的知识发起挑战。

最重要的是这份书单可以促使人们进行独立思考，以有限去接近无限，重新构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。

（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）